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 陈嘉明 著

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 十五讲

不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
总之都标志着某种时代精神，
具体表现为思想和感觉的方式、行为和举止的方式。

按照这样的理解，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同，
就在于两者的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不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089
C454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 十五讲

□ 陈嘉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089
C4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陈嘉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4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ISBN 7-301-10585-1

I. 现… II. 陈… III. ①现代主义-研究②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000 号

书 名: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著作责任者: 陈嘉明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585-1/B·036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3.25 印张 38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多学科普及读物。全套书系计划出版 100 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二批近 50 种将在 2004 年内出齐。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质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

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这些年来,各地也陆续出版过一些面向素质教育的丛书或教材,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好通识课,使之能真正纳入正常的教学系统,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是许多学校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起,联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经过广泛的调查,并征求许多院校通识课主讲教师的意见,提出要策划一套大型的多学科的青年普及读物,同时又是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并由他牵头,组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编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有效地联合了许多重点大学,协力同心来做成这套大型的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书系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

编写出版这套书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本书系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2001年底,本书系的第一批课题确定。选题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也参考了一些重点大学的相关课程安排。课题的酝酿和作者的聘请反复征求过各学科专家以及教育部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得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

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学者们如此关心和积极参与素质教育之大业,应当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书系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每一种书都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专业教科书,不是专业课的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读者,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进学生的人格素养。本书系每一种选题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并能加以普及,因此对这套书作者的要求很高。我们所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的重量级学者,是请“大家”来讲“通识”,所以命名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其意图就是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书,亲炙名家名师课堂。

本书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这些作者有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学习和思考的兴趣。

本书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

本书系的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考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本书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讲”,主要是要求在较少的篇幅内讲清楚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而选为教材,十五讲又正好讲一个学期,符合一般通识课的课时要求。同时这也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的鲜明特色,一个图书品牌。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既能满足社会上读者的需要,又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目 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1

第一讲 “现代性”概念与启蒙精神/1

一 “现代性”概念的起源与界定/2

二 启蒙与现代性/5

第二讲 现代性的性质与特点/24

一 “现代性”的主要内涵与特征/25

二 现代性与现代化/36

第三讲 康德哲学:现代性的序幕/47

一 “现代性态度的纲领”/48

二 理性的批判及其建构/51

三 理性神学与道德的宗教/57

四 自由的权利与国家的理念/62

第四讲 黑格尔:现代世界的理性与自由原则/70

一 “理性是世界的灵魂”/71

二 现代世界的“自由”原则/75

三 宗教是实践理性的需要/83

第五讲 韦伯的理性化的现代性分析/95

- 一 现代性的特征:理性化/95
- 二 理性化的诸种表现/102
- 三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106
- 四 现代性的冲突/110

第六讲 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与后现代性/117

- 一 “后现代”概念与后现代话语的产生/118
- 二 后现代话语的思想渊源/122
- 三 “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129

第七讲 尼采:后现代性的开端/141

- 一 现代性的虚无主义/142
- 二 “理性”与知识观批判/147
- 三 权力意志与价值颠覆/152

第八讲 海德格尔:现代性与存在的意义/163

- 一 现代性的本质:世界成为图像/164
- 二 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终结/170
- 三 追问存在:虚无主义的克服/174
- 四 “无家可归”与人的救渡/178

第九讲 福柯:规训的现代社会及其主体/186

- 一 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态度/187
- 二 “未崩溃的”现代性的合理性/192
- 三 规训的现代社会/196
- 四 权力造就的主体/201

第十讲 利奥塔:现代性元叙事的解构/210

- 一 现代性与“元叙事”批判/211
- 二 知识与合法化问题/215
- 三 后现代的合法化模式及其悖谬逻辑/224

第十一讲 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的发展/236

- 一 现代性的性质与动力机制/237
- 二 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与全球化/242
- 三 现代性的“风险”/247
- 四 现代性的超越——后现代性/250

第十二讲 詹姆逊:后现代性与晚期资本主义逻辑/260

- 一 现代性及其基本准则/261
- 二 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267
- 三 后现代的文化逻辑/273

第十三讲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重建/284

- 一 现代性话语的反思/285
- 二 现代性规范基础的重建/291
- 三 现代性的规范内涵/297

第十四讲 哲学范式的转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309

- 一 个体理性与主体中心的解构/310
- 二 “合理性”范式的变化/315
- 三 从认识论走向解释学/322

第十五讲 消费社会、全球化与后现代性/332

- 一 消费社会与后现代性/332
- 二 现代性的隐忧与后现代性的悖论/342

后 记/356

第一讲

“现代性”概念与启蒙精神

“现代性”概念的起源与界定

启蒙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纷争的理论领域,其中不仅交织着对它的各种不同困惑与理解,而且更充满着对它的批判与解构的尝试。从概念所涵括的范围来说,它包含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从时间的跨度上说,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现代性话语而言,从18世纪后期开始,它“就已成了‘哲学’讨论的主题”^[1];再从空间的广度而言,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与论争,也早已超出欧美的西方世界,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在我国国内,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性”概念逐渐形成理论界的一个关注热点,有关它的话语也越来越流行,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一时间,这方面的译著相继面世,学术刊物上的现代性专栏也陆续涌现,尔后见到的就是一些研究专著在书店书架上的亮相。

为什么现代性的研究在中国会“热”起来?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不难得出。因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开始向现代社会迅跑

的时期。因此,伴随着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现代转型,人们自然相应地关注它的哲学与文化层面的性质与形态,亦即关注它的思维理念、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方面的东西。此外,应当说使现代性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的,还有另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即“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概念的出现及其传入。与“现代性”针锋相对的“后现代性”概念的问世,自然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并引发了探讨的兴趣。当西方已经开始谈论“后现代性”的时候,我们究竟应当形成什么样的现代性?我们是否能够依据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来达到“扬弃”现代性的目的?甚至还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是否可以超越现代性,直接进入后现代性?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曾经说过,概念构成认识之网上的一个网结。不过,这里我们还应当说,“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概念构成的不是一般的认识网结,而是观察、理解我们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观点。科学哲学上有句名言——“理论先于观察”。它告诉我们,没有纯粹的观察,任何观察已经预以某种理论为前提,它就像一副眼镜一样,借助它我们得以理解我们所观察的对象,对其作出某种解释。现代性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来说,所起的正是这样一种功能。

一 “现代性”概念的起源与界定

“现代性”一词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曾经对它的语源进行了考察。他指出,这个术语至少从17世纪起就在英国流行了。《牛津英语词典》记录了“现代性”(modernity,意思是“现时代”)一词在1672年的首次出现。该词典还援引了霍勒斯·沃波尔的话,他在1872年的一封信中谈论查特顿的诗歌时,说到了任何只要有耳朵的人“都不能原谅”的“他们‘语调的现代性’”。在沃波尔的用语中,“现代性”意味着对审美的某种微妙的感觉,它似乎一方面接近于个人“风格”的概念,另一方面则接近沃波尔本人所说的“观念与措辞的晚近倾向”。

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解释,沃波尔主要是在音乐方面使用现代性这个词的,也就是说它主要与声音和语调有关。^[2]

卡林内斯库还提到,在法语中相应的 *modernité* 一词,其出现比英语要迟得多,人们曾找到它在 19 世纪中期时的三处使用。利特雷词典在泰奥菲尔·戈蒂埃发表于 1867 年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它;罗贝尔词典发现它首次出现于夏多布里昂出版于 1849 年的《墓中回忆录》;不过,这两本词典都没有提及美学家波德莱尔在他写于 1859 年、发表于 1863 年的论康斯坦丁·盖伊的文章中也曾使用过“现代性”一词。在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这篇文章中,他写出了有关美学现代性的一句名言:“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3] 这里,波德莱尔将现代性作为一种强烈的、当下的时间意识,使它与代表着永恒与不变的“过去”相区别,进而强调现代艺术应当着眼于对当下的、转瞬即逝的事物的感受,强调对当下的灵感、情感的捕捉,而不是回到古代去寻求纯艺术的、永久可靠的美的观念。虽然对当下生活中的美加以想像与创造具有某种神秘的意味,但它却是“一切创造性的源泉”。美的永恒就存在于过渡与短暂中,这就是艺术的时间悖论。这样,现代性在波德莱尔那里并不是某种用以对现代与古代加以分期的标签,而是一种对现代艺术新观念的倡导。

对“现代性”术语的溯源,在美国后现代哲学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那里走得更远。他写道,可以使人惊讶的是,“这个词早已在公元 5 世纪就已经存在”。不过,基拉西厄斯教皇一世(494—495)使用该词来表示的,仅仅是对先前教皇的时代与当代作出的区分,也就是作为一种年代的分期,而不含有现在优越于过去的意思。然而,差不多处于同一时期,当卡西奥德洛斯写作时,即哥特人征服罗马帝国以后,这个词开始有了新的含义。在这位研究文学的学者看来,“现代”的对应词是“过去”。虽然从教皇的角度看,哥特人新建立的帝国并没有在基督教传统中形成一种断裂,但对于知识人士而言,它却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分界,使得先前的古典文化有别于现代

文化,而后者的任务在于对先前的文化进行再造。詹姆逊指出,正是这种“分界”使得“现代”这一术语形成了特定的意义,并且这一特点延续至今。

以上我们大致了解了“现代性”一词在西方的语源学情况,不过显然我们更会关心的是在当代的理论论争中,这一概念究竟意指什么。在现今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现代性概念的界说中,比较著名的有如下三个。

一是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他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4],因此他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指称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包括其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在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中,他特别突出了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视之为在这种断裂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后传统的秩序”。^[5]因此,现代性与传统的区别,在吉登斯那里根本在于一种“制度性的转变”,即在制度性、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的秩序的改变。它具体表现为两个突出的结果:一是对于社会而言,它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的“全球化”;二是对于个人而言,它确立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我该如何生活”的思考与追求。

二是哈贝马斯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6],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问题。对于中世纪社会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一个神权的社会里,宗教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有关的答案,《圣经》的上帝创世说、原罪说等已经为现世的合理性作出了回答,人生的目的已被定位为依靠对神的信仰、通过禁欲而求得灵魂的救赎。而自启蒙运动以来,当人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与文化的时候,这种以自由等天

生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以及相应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安排,随着价值来源根据的转换,其合理性何在,就成了需要确证的问题。既然世界已不再被看作是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设计,自然这种合理性的根据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因此理性成了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成了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

三是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7]特别地,这种现代性的“态度”或“精神气质”,福柯把它解读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对时代进行“批判性质询”的品格。在论述启蒙的意义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我们应当从启蒙中继承下来的精神财富,或者说能够连接起我们与启蒙的共同的 attitude,正是这种对时代进行永恒批判的哲学气质,而不是去忠实于某种信条。因此,对于福柯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以上我们看到,这三位思想家对现代性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读。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福柯同样也从哲学的视角出发,不过却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批判精神。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我们将看到更多的这类答案不同的解读。这种情况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解释学所谓的文本的可解释性与“多义性”。文本的意义是可以通过解释而不断产生的,这些意义的不同来源于解释的视角的不同。

二 启蒙与现代性

谈论现代性,不能不讲到启蒙。因为通常认为,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

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

“启蒙运动”这一概念,通常指的是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一场广泛而有力的思想运动^[8],其宗旨是运用理性来破除宗教迷信和盲从,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使人摆脱其蒙昧状态,达到一种思想与政治上的自主性。

启蒙运动的上述特征,得到许多思想家们的认同。例如,在 18 世纪伟大的德国启蒙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看来,启蒙就是使人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上在于人们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当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也指出,在启蒙的传统中,启蒙思想总是被理解为神话的对立面和反动力量。之所以说是神话的对立面,是因为启蒙用更好论据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来反对世代延续的传统的权威约束。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这位以研究政治思想史、尤其因提出“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的区分而闻名于世的当代英国哲学家,同样把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概括为:“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权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9]即使是对启蒙运动持激烈批判态度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也认为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

虽然通常把 18 世纪的法国称为“启蒙的时代”,但法国的启蒙思想的先行者最是从英国得到其启蒙的观感的。伏尔泰这位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领军人物,曾经在 18 世纪的 20 年代后期流亡到英国。这次流亡的经历,有如一位伏尔泰研究专家所评论的那样,“是如同穆罕默德从麦加到麦地那那样的决定性逃亡,……从这次逃亡中,一种正式的毁灭性哲学被严肃地提到议事日程上”^[10]。也就是说,伏尔泰在这期间形成了他的启蒙哲学思想。他于在英国所撰写的一部后来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其出版标志着启蒙思想的宣传运动正式开始的《哲学通信》中,表露了英国作为一个开明

社会在自己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他赞叹在这里“理性”是自由的,“才能”得到尊重,科学家牛顿的葬礼极备哀荣;在这里有国家的自由,贸易的自由,还有宗教的宽容,甚至连三种传统模式的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都能够相互制约,以一种恰当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伏尔泰对英国社会的这些赞誉之词,实际上已大体道出了启蒙的一些基本价值与精神,这就是对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肯定与推崇。而启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也正是在于后者对这些基本价值与精神的追求,并依据它们形成了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与行为方式。

1. 启蒙的理性主义精神

启蒙的目标既然是消除蒙昧、开启民智,那么价值之源自然就不能像以往所信奉的那样来自神的启示。这条天启之路一旦斩断,则人们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理性,亦即理智。这也就是说,要消除蒙昧,只有依靠自救,即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大胆地去思想。这样,在启蒙的时代,理性就担当起思想批判的重任,成为审判一切已有的宗教、哲学、法律与政治观念的“法庭”。20世纪英国哲学家欧克肖特曾经一语中的地描绘了理性主义者的这一基本气质和特征:“思想除了‘理性’的权威外不服从任何权威。……他是权威的敌人,偏见的敌人,传统、习俗和习惯的敌人。”^[1]

理性主义首先是建立在对“理性”能力的确认之上的,也就是把理性确认为一种不同于感性、情感、意志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思想、反思、从事逻辑判断与推理的能力,集中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能力,或者说“我思”的能力。在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伦理学与宗教哲学上有着不同的表现。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是其他领域的理性主义的基础,它主张在获取知识方面,理性比其他认识能力具有优越性;这一观念是与经验主义正相对立的,后者强调感觉是一切认识的来源。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主张道德的原则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情感、同情或其他非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宗教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则是反对宗教知识中以“天启”为核心的